从苏联模式到中国自主发展道路

——论中国道路的选择

何　花
(绵阳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 绵阳 621006)

[摘　要]　新中国成立后,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我国不得不向苏联学习,但同时也照搬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它曾经使我国取得了“一五”计划的辉煌成就,但是,到 1956 年左右,苏联模式的弊病不断暴露。苏共二十大后,我们以苏为鉴,试图修正苏联模式,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是,由于多种原因,中国式的自主发展道路并不顺利,始终没有突破苏联模式的框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继续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成功,而且最终突破了苏联模式。说明走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根据本国实际和人民的意愿和能力来选择自己的道路。

[关键词]　苏联模式;　移植;　修正;　反思;　自主发展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755(2013)05 - 0025 - 06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也称斯大林模式)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辉煌时期,使苏联一跃成为世界的老二,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没有经验,在学习苏联的同时,不自觉地照搬照抄了苏联模式[1]365。但是,斯大林去世后不久,苏联模式逐渐暴露其弊病。中国共产党人为了突破和超越它,进行了不懈探索。总体上讲,在改革开放前,我们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和修正遭到失败;改革开放以后,新的领导集体披荆斩棘,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在继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过程中,最终成功突破苏联模式。总结苏联模式在中国的历史命运,对于我们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　苏联模式移植中国及其效应

1952 年,中国举行了“中苏友好月”活动,掀起了全面学习苏联的高潮。“一五”计划时期,苏联模式在中国基本上得到了全面移植。模仿苏联模式,正如毛泽东指出:“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是当了苏联人的奴隶,跟在他们的屁股后面走,什么都学苏联的。”[2]尤其是他指出了经济工作中的重工业和计划方面,由于我们自己不懂,完全没有经验,只好搬[1]368。

首先,在工业化发展道路方面。李富春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作第一个五年计划报告时就指出,我国要实现的工业化,是“以苏联为榜样并在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直接帮助下的工业化”,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3]。实践证明,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在我国曾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一五”期间,我国工业生产远远超过旧中国的一百年,也远远高于同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增长速度。到 1957 年,“一五”计划提前完成,农业总产值达 604 亿元,比 1952 年增长 25%,年均增长 4.5%;交通运输事业、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和卫生保健事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全国物价基本稳定,人民生活明显改善[4]。这些都是因为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发展战略的缘故。因为,对于当时象中国这样一个没有原始工业积累的薄弱大国来说,在工业化发展初期,只有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才能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和资源等优势,迅速建立起工业化的物质基础。

第二,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社会主义改造,通过生产关系的所有制变革,实现了旧制度和体制的自我更新,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1953 年以后,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中国开始了“一五”计划的编制,并在实践中不断实施。“一五”计划时期,我国仿照苏联模式,形成了单一的中央集权的计划

[收稿日期]　2013 - 07 - 03
[基金项目]　绵阳师范学院引进人才科研基金资助项目(课题号:QD2012B06)
[作者简介]　何花(1972 -),女,四川南充人,绵阳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

经济管理模式。不仅在计划体制方面,而且在工业管理体制、财政体制、基本建设体制、物资体制、商业体制和劳动工资体制等方面,都程度不同地模仿了苏联。邓小平后来指出:“我们有些经济制度,特别是企业的管理、企业的组织这些方面,受苏联影响比较大。”[5]235并指出:“许多企业追求大而全。”[6]617

第三,在政治体制方面。主要是模仿了苏联的国体形式,党的领导方式和干部管理制度等方面。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形式上看似与苏联有异,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确立了“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7]。我国政党制度实行一党领导,但由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特殊历史关系,中共八大对党的体制作了一些调整,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关系,这一点与苏联稍有不同。在干部制度上,中国同苏联一样,实行任命制与事实上的领导职务终身制。邓小平后来对波兰领导人指出:“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8]178,并指出它“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6]376的弊病。

第四,在文化教育体制方面。苏联模式的文化体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指导思想,无论是宣传教育,还是科学研究,都必须以此为指导。我国在建国后不久,在新闻、舆论宣传、教育和科研等领域,也实行指导思想一元化的文化模式。这实际上是共产党的政治和经济一元化领导在文化领域的反映。中国对苏联教育体制的效仿尤为严重,由原来学习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教育体制,转向效仿苏联的教育模式。毛泽东指出,对苏联五分制、小学五年一贯制等教育方面的制度我们都搬得相当厉害[1]368。照搬苏联教育模式,正如有学者指出,是因为建国初期,由于我们没有建立高等教育的经验,因而,把苏联的一套照搬过来,以此改革我国的旧教育体制,这在当时是必要的,基本上符合了国家建设的需要[9]。

除上述方面外,我们还在其他一些领域,比如卫生、军工体制等方面仿效了苏联模式。邓小平后来指出:“苏联体制的突出问题是军事工业孤立地一马当先,带动不了民用工业,带动不了整个经济和技术。”[6]1119不仅指出我们照搬苏联军工体制,还指出了其带来的弊病。有些领域搬得少些,有些领域几乎是全搬,主要是工业和教育两个部门搬得厉害[1]365。在“一边倒”外交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在改造的基本目标、基本内容和主导力量等方面,都“一边倒”向苏联。

从苏联模仿过来的社会主义体制,一方面,它曾经适应了刚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而来的新中国的发展需要,有其积极的正面效应。因为当时新中国生产力水平不高,经济结构比较简单,国家政权又不巩固,在这样的条件下,适当强调集中统一,重视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这有利于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智力,统一使用和统一调配资源,保证了解决中国当时最急需和最关键的问题。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也曾指出,“原有经济体制有它的由来,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这可以从我国经济的巨大变化可以窥见。从 1953 年至 1957 年,中国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18%,这样的高速度在世界经济史上是罕见的;从全国社会总产值的构成来看,1957 年总产值达到 1606 亿元,比 1952 年增长 70.9%,其中,农业产值的比重下降为 33.4%,工业产值的比重上升到 43.8%,初步改变了中国经济以农为主的局面;从工业总产值的构成来看,1957 年工业总产值达到 704 亿元,增长 1 倍多,其中,轻工业产值的比重下降为 55%,重工业产值的比重上升到 45%,开始改变了工业以轻为主的局面。总之,“一五”计划时期,农轻重工业得到了程度不同的发展,使中国迅速摆脱了过去工业残缺不全、基础薄弱和落后的局面,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为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得到加强,人民群众的文化科学水平得到了较大的进步和发展,这些都是苏联模式在中国产生的良好效应。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模仿苏联模式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负面效应。有学者指出,从两国结盟一直到社会主义建设上,中国社会主义都“全盘苏化,照搬苏联模式,中国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10]“一五”计划由于过分强调重工业而忽视农业、轻工业,导致中国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只有 4.5%,大大低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年均 14.1% 的增速,重工业年均增长 25.4%,轻工业仅有 12.9%[11]。同时,“一五”计划的实施,使中国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地方和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性、独立性和活力。再者,由于过分迷信苏联技术和管理方法等,我们缺乏独创性。毛泽东曾经指出,“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12]毛泽东指出问题出在“硬搬”,“硬搬”就是不顾实际,没有独立思考[1]366,没有了

解彼此的情况,因而使我们在胜利的同时跌得更惨。

二　对苏联模式的修正及其失败原因

苏共二十大以前,毛泽东早已觉察到苏联模式的弊端并试图纠正。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在 1955 年底提出了要“以苏为鉴”[13],走自己的路。1956 年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提出“第二次结合”[14],自主探索的突破口与转折点由此开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最开始反映在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它提出了引以为鉴[1]23,从十大关系即十大矛盾,来寻找一条比苏联模式更快更好地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论十大关系》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是“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1] 369,这为后来突破苏联模式的困难埋下了伏笔。

特别是党的八大,制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自主探索的行动纲领,提出了很多重要思想,如关于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判断;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综合平衡地发展国民经济的建设方针;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方针,即以国家和集体经营的工商业为主体,个体经营为补充,以计划生产为工农业生产的主体,以自由生产为补充,以国家市场为主体,以自由市场为补充;关于加强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以及加强党的建设的方针;提出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等思想。1956 年底,由于国内发生农民闹退社、学生罢课、工人罢工等事件,国际上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强调要处理好人民内部关系。如果说《论十大关系》侧重于“以苏为鉴”,那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则着重于“以匈为鉴”,目的都是为了要把我们自己国内的事情解决好。

但是,1957 年夏季以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左”倾思想指导下,不断偏离了正确的发展轨道。先是 1958 年生产上搞“大跃进”,大放“高产卫星”,后是政治上不断提出要抓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大跃进”。我们不仅没有突破苏联模式,反而在某些方面强化了它。比如政治上越来越高度集权,一党专政,一言堂、家长制作风盛行;经济上越来越高度集中,搞单一的公有制,实行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文化上越来越强调绝对一元化,全盘否定我国的传统文化和完全排斥西方先进文化。

笔者以为,对苏联模式修正的失败,至少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在理论上没有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由于对社会主义的教条理解,我们把苏联模式当成了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把它看成是社会主义的神圣祭坛,不敢对它作根本性的改革。如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越大越纯越好;认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应该占领一切领域;认为马克思所说的按劳分配具有“资产阶级法权”性质,因而应该限制和批判;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而形成一系列“左”倾的城乡经济政策和城乡阶级斗争政策;认为无产阶级要注意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复辟,所以不停地展开批判资本主义的斗争等。特别是文革时期,“四人帮”一伙大批特批“唯生产力论”,把社会主义与私有制、商品经济绝对对立起来,对社会主义造成了严重误解。

第二,对独立自主原则的偏执运用。突破苏联模式,为的是消除其弊病,独立自主地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正如毛泽东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1] 380 然而,由于不断强化阶段斗争,强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我们却不断维护苏联模式,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中苏矛盾激化后,尤其是文革期间,我们不仅与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处于对立状态,也与资本主义国家处于对立状态,被迫走上了封闭发展的道路。同时,在对外关系上,把凡是与外国往来的行为都视为崇洋媚外,卖国行为,搞洋奴哲学。对独立自主的错误认识和歪曲运用,使苏联模式不断被强化。

第三,没有按客观规律办事。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从来就是该国和民族自己的事情,只能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去解决。这就是独立自主原则。但是,它不能凭主观意志办事,违背客观规律。“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就是违背客观规律的产物,是对列宁“文化革命”严重误解所致。列宁晚年曾经指出:“我们不得不承认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15] 列宁的“文化”概念,既包括物质文明,也包括精神文明,而不是我们强调的脱离生产力的发展一味去搞“思想文化”革命。同时,他强调“文化革命”要在不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不断完善其上层建筑来

实现,而不是靠暴风骤雨式的革命运动和阶级斗争来实现。而我们却背道而驰。

第四,没有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和中国化有机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此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16]这就要求我们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每一种理论都是针对具体历史条件来讲的,没有一劳永逸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也是一样,要与时俱进地不断发展,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有机结合起来。以前我们更多注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20 世纪六七十年代,革命与战争的时代主题逐渐淡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初现端倪,但我们由于被封锁,看不到西方发达国家和周边国家的新变化和新发展,对时代特点和国情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和误判,从而中断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的同步进行。缺乏新的理论指导,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充满曲折。

虽然,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突破苏联模式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总体上没有取得突破性的成绩。但是,它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经验教训财富。胡绳先生曾经指出:“在他的学生手里,能够抗拒任何风霜的花和果实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繁茂地生长起来。”[17]

三 在对苏联模式的再次反思中成功开启中国自主发展道路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着重从以下几方面,为再次思考如何突破苏联模式,继续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和认识前提。

首先,邓小平尖锐地指出苏联模式存在着的严重弊端,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大胆解放思想,重新独立思考。邓小平指出:“苏联从斯大林时期开始,他们的思想方法实际上是形而上学,认为一切都是苏联的最好,其实很多并不是这样,结果自己把自己封锁起来,变成思想僵化。这妨碍了他们科学技术的发展,他们落后了。”[6] 235他进而指出:“苏联就吃这样的亏,自以为什么都是自己的好,其实农业、技术都很落后,结果是自己骗自己。”[6]429他还指出了这种僵化体制弊病的更深根源:“实际上是把整个社会和人民的手脚都捆起来了。”[6]1077我们学习苏联模式,也在某种程度上严重束缚了自己的手脚,造成在国际上闭关自守,因此,“经济虽有发展,但速度很不理想,绝大多数人仍然处于贫困状态。”[6]1077他因此告诫人们不要迷信苏联模式、要从苏联模式彻底解放出来。

第二,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了较清醒的认识。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6]1070他赞赏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它的实质是发展商品经济,是最早的对社会主义的一种经济改革思路,破除了人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模式,这实际上成了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论渊源。针对有人指出社会主义只有计划经济,没有市场经济,邓小平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6]580-581以后,又在不同场合强调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这对我们突破传统苏联模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针对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应该比资本主义有更高更发达的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一是发展生产力,一是共同富裕,只有发展生产力,才能使全体人们走向共同富裕等等。这些思想都为我们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搞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指南。

第三,要求正确处理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关系。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根据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教训,慎重地向全党告诫:“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8]2针对国际友人把我国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等同起来的片面理解,邓小平一方面指出我们照搬苏联模式,并为此吃了亏,指出要吸取经验教训,同时,他还指出我们过去没有完全照搬,带有自己的特色。他说:“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对资本家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采取赎买的政策,不是剥夺的政策……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中国要形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也与苏联不同。”[5] 235后来他又提到:“我们最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6]629这些对我们坚定走独立自主的道路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他提出要把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结合起来。因为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这方面“我们吃过这个苦头,…不开放不行。”[8]90只有把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有机结合起

来,才能不断增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

第四,强调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和路线。针对我国曾经不顾实际,盲目学习别国和夸大主观意志的作用,邓小平倡导“解放思想,实际求是”原则,根据实际来制定方针政策。他指出:“搞建设,单有雄心壮志不够,没有具体政策、具体措施,就像氢气球一样,一吹就破了。”[6] 211 因此,“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6]1176 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基础上,邓小平强调“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6] 502,搞“中国式的现代化”。他指出:“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我们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能不能达到人均上千美元? 等到人均达到上千美元的时候,我们的日子可能就比较好过了。”[6]563 - 564 他认为“目标不能定得太高,定得太高了办不到。”[6]644 后来,他又进一步强调:“到本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八百至一千美元,进入小康社会。”[6]681 这些体现了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第五,要求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邓小平指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6] 1176 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推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产生。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当今时代发展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要求把握时代主题,顺应时代发展,提出与时代要求相符合的任务,抓住历史和时代机遇,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同时,他还指出了学马克思主义“要管用”、“要精”,不是搬马克思主义的大部头。这对我们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创新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了重要作用。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从上述思想认识问题着手,还针对当时中国面临的比较突出的问题,制定了相应的方针政策,比如重新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注重发展生产力;从农村改革开始,逐步向城市改革全面推进;由点到面、由线到体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格局;在经济改革的基础上,不断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要求,推进了民主和法制化建设;坚持“两手抓”、“两个文明同时建设”等一系列方针政策。正是在这些正确的思想方针政策下,我们党才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而冲破了苏联模式的牢笼,使社会主义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

与此相反,苏联领导人却对苏联模式一直不思改进,持保守态度。戈尔巴乔夫上台不久后,却又大肆兜售其所谓“新思维”,不仅没有正确认识苏联模式,还搞乱了苏共全党和全社会的思想,使苏联社会主义的改革走向了“改向”。正如邓小平指出:“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又都是不同的,历史不同,经验不同,现在所处的情况不同,各国的改革不可能一样。但是,共同的一点是要保持自己的优势,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毛病和弊端。”[6]1195 苏联改革最终走向了资本主义道路,这对我们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教训。1989 年,我国改革进入了一个重要时期。在此紧要关头,邓小平坚定地指出:“别人的事我们管不了,只讲一个道理: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6]1287 苏东剧变后,邓小平尖锐指出:“苏联这么强的国家,几个月一下子就垮了”,“如果中国不接受这个教训,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如戈尔巴乔夫那样的‘新思维’出来以后没注意那样,就会出事。”[18] 后来,邓小平在南巡途中,阐述了很多重要的思想和理论,这不仅廓清了我们对改革的很多疑惑,同时也为我们彻底突破苏联模式,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吃了一颗“定心丸”,提供了保障。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续坚持走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21 世纪以来,随着我国主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融入到全球化经济浪潮中,我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国际影响不断突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来越显示其生机和活力。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新的境界。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步伐不断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以及“四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中国模式”又逐渐进入西方政要和学界的视野中。它实际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党的十七大文件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并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道路和理论体系,它们构成三位一体,充分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党的十八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不断得到了进一步

深化、丰富和发展,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这是新的三位一体思想,指出我们党已不断形成了“三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2013 年“两会”以来,“中国梦”这一主题词又不断开始深入中国人民心中,习近平主席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即“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还指出,“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自己才知道”。这些表明:我们党和国家在坚定走自己的道路方面已充满了信心和决心。

综上所述,我国社会主义从模仿苏联模式到走自主发展道路,它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作用,即一定要根据本国实际和时代要求,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正如邓小平指出:“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6]1210“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否则就会信息不灵,睡大觉,而世界技术革命却在蓬勃发展。”[6]1270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全新的事业,不可能象涅瓦大街那样笔直平坦。只有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根据各国不同情况,依靠本国人民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地进行探索和实践,才能找到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和模式。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9 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213.

[3]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8[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46.160.

[4] 张岂之,杨先材. 中国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86.

[5]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 邓小平年谱(1975—1997)[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4 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554.

[8]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9] 李 琦. 建国初期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述评[J]. 党的文献,2002(6):71-77.

[10] 沈志华. 中苏关系史纲[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2.

[11] 虞和平主编. 中国现代化历程:第 3 卷[M]. 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1013.

[12] 毛泽东.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831.

[13] 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上卷[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472.

[14] 吴冷西. 十年论战—1956-1966 中苏关系回忆录: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23-24.

[15] 列 宁. 列宁全集:第 4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67.

[1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4.

[17] 胡 绳. 胡绳文集[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94:182.

[18] 参见吴松营. 邓小平南方谈话真情实录[N]. 东方早报,2012-01-18(A06).

From the Soviet Model to Chinese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Road

HE Hua

(*M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Mianyang* 621006,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in in the period of transition from New Democracy to socialism, China has to learn from the Soviet model, but at the same time also copy the Soviet Socialist Model. Although it once made China have brilliant achievements in the “one- five” plan, around 1956, the Soviet pattern constantly exposed its defects. After the Twentie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we Learned a lesson from the Soviet Union, tried to correct the Soviet mode in order to explore our socialist road in construction. However, due to many reasons, Chinese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path is not smooth, After the framework of the Soviet model was not successfully broken through. After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leventh Central Committee, our country implemented reforming and open policy, and reexplored the road of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style. Practice has proved that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not only successful, but also eventually breaking through the Soviet mode. it proves that taking the socialist road must insist to stand on one's own thoughts and rely on one's own efforts, choosing our own way according to the reality of our country and the willingness and ability of her people.

Key words: the Soviet model; transplantation; correction; reflection; independent development